

以平台为抓手， 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

□ 隋福民

摘 要: 中国农业产业升级面临诸多挑战: 小农户数量多, 非农就业转移空间有限, 人们对产业升级路径的认识不尽一致等。传统的农业产业升级思路是改造生产端, 但本文认为应该从流通端入手, 让流通端带动生产端的改变。改造流通端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建设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让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 让农业生产端升级的利润主要回流到小农户手里, 从而引致中国农业产业的自动升级。

关键词: 农业产业升级 流通端 赋能 平台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43(2020)06-0058-009

DOI: 10.16072/j.cnki.1243d.2020.06.009

一、农业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 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 碗里面主要要装中国的粮食。这一方面是说, 我们的粮食主要依赖于自己生产, 不能完全指望国际贸易, 即我们要保障一定的粮食自给率, 尽管按照人地资源比例来说, 我们在农业生产上不具有经济学理论中所言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暗含了对供给优质农产品的期望。粮食光有数量不行, 还要有质量, 否则, 也是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我们应该食用优质农产品, 而且, 在经济已然发展的今天, 我们也有理由有条件食用优质农产品。当然, 这不仅包括主粮作物, 还包括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就目前的生产和销售情形看, 粮食数量是可以保证的, 在广大农户的努力下, 我们的粮食产量在近

些年来一直维持增长态势。蔬菜、水果、肉、蛋、奶的产量也在不断提高。然而, 不得不指出的是, 尽管国家很重视农产品质量, 但据我们的调研, 农产品存在的安全问题仍然很多, 大规模使用、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事件屡见不鲜, 甚至土壤已经产生了依赖性, 小农户传统的农业耕种方法已经被彻底废弃了, 大田作物已经很少使用粪肥了。蔬菜、水果的种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比如除草剂、膨大剂等化学品的高频使用。养殖过程中虽不存在化肥使用问题, 但是为了谋利, 也会在饲料喂养中过量使用添加剂, 包括使用一些违禁物, 比如瘦肉精等。伴随着各种工业用品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 农业污染以及它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正在不断加深。比如, 在种植上, 粮食增产的同时造成土壤持续板结, 一些重金属污染越来越严重, 水资源也在不断减少和恶化; 在养殖过程中, 环境恶化、粪肥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使

收稿日期: 2020-09-16

作者: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农村经济。邮编: 100044

得农业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中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已然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

二、农业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第一,小农户数量多。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的农业生产主体仍然是小农户。无论是主粮作物,还是蔬菜、水果、肉蛋奶等都是如此。从占有耕地面积的数量和比例上也可以看出小农户的主体性。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全国2.3亿户农户的户均经营规模只有7.8亩。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占地面积会扩大,但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第二,非农就业转移空间有限。一般而言,按照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不足20%上升到60%,就体现了这种城乡转移。而目前,这种“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其标志就是劳动力价格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快速上涨。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放缓,滞留在乡村的大量农业人口由于年龄结构等原因无法向非农业转移。而且,中国的工业生产也无法继续持续吸纳农业人口,一方面是外部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城市也难以承载大量农业人口的进入。目前,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6亿人主要都在农村,6亿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近2倍,这种巨量人口向哪里转移对于一个已然是制造业大国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或许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农村人口的代际死亡也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但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三,由于小农户太多,人们有动力通过勤勉劳动来增加产量,因此,中国农产品从数量上看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但由于生产主体分散决策,个别农产品的供求曲线变化较大,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在价格变动过程中,由于小农户销售农产品是没有选择的,从而在出售时缺乏议价能力。小农户的持续增收陷入了困境。在这种局面下,如何

持续提高他们的收入,如何保障农业的安全,这些都对农业产业升级形成了挑战。

第四,人们对小农户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认识。很多人天然地认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是不相容的。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农业就是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人均占有较大数量的土地,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还能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通过规模经济和一二三产融合来获得利润。而小农户不具有这样的生产经营能力,他们思维保守,不会采用新技术,也不敢融通资金,喜欢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小农户是“落后”的代名词,是他们拖了农业的后腿。然而,实际上,农民在理性计算和决策上,与城里人、有知识的人或者工商业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也具有足够的经济理性。舒尔茨和恰亚诺夫的论证都表明了他们的经济算计能力。按照舒尔茨的说法,农户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是现代生产要素。^①在他所研究的时代,指的就是种子、化肥等提高产量的技术和要素供给不足,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绿色革命”。这种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产量的模式于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地也迅速普及。^②

第五,人们对农业产业升级的要义认识不够深刻。说起农业产业升级,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高大上的产业园区或者植物工厂之类。认为农业产业升级就是采用更多的机械,采用更多的自动化设备,比如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循环农业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升级的本质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生产出优质农产品,而且能让普通消费者购买得起。如果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供部分人享用,大部分人享用的是标准较低的农产品,那就不是农业产业升级。

第六,人们对农业产业升级的路径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农业产业升级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于农民数量太多,农产品供大于求,因此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产业升级,只能交给时间。随着农业人口的代际减少和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优质农产品才能逐渐地被提供被普及。另一种是认为通过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推

① [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2—43.

② [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7+84—127.

动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对家庭农场等规模经济主体进行补贴等方式,我们就能改造农业。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瑕疵。第一种看法是无奈之举,有点消极,看不到新的可利用的因素;第二种看法则把农业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只用线性的工业化思维来推进农业,看不到农业的复杂性,同样也看不到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生产经营模式。

上述六点挑战中,其中前三点属于客观条件的约束,是我们农业产业升级必须要考虑的;后三点属于主观认识上的偏差,思维决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我们农业产业升级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的主流思路:改造生产端

目前的农业产业升级思路主要是从生产端着手的。从近些年来的中央 1 号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比如,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园区的重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是以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为主要特点,以科技开发、示范、辐射和推广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主要目标。2017 年以来,中央财政已投入 50 多亿元奖补资金,批准创建了 62 个国家级产业园。随着国家级产业园的创建,各地也迅速行动,全国各省财政累计已安排 125 亿元专项投入,创建了 1 000 多个省级产业园和一大批市县级产业园。各类市场主体也纷纷涌入产业园,近 100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和近 500 家省级龙头企业入驻国家级产业园,一大批新型经营主体在园区内孵化成长。我们相信,这些园区内的主体在生产技术上处在科技前沿,但它们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也是非常高昂的。除了某些高端客户,一般人消费不起。其示范作用确有一些,但也仅仅停留在示范上,因为这种资本密集型的模式普通小农户根本无法复制。

我们曾经很重视家庭农场和新型农业生产。一度我们认为农村有很多农地都撂荒了,于是鼓励流转,鼓励家庭农场。我们也曾认为,小农户不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于是倡导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觉得只要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他们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就能建立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家庭农场。然而,这一倡导在实践中看不出成功。据我们的调研,这些新型主体能够成功的似乎很少,个别

还能坚持的,也是咬牙扛着。因为他们确实低估了农业的复杂性,低估了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做中国农业需要在基础设施上有着大量前期投入的任务的艰巨性。还有一些主体,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思根本没有用在农业产业升级上,而是看中了土地。这些土地在他们的运作下有可能从耕地变成建设用地,进而他们可以开发第三产业,搞养老地产等类房地产式的运作。他们也知道,农业不可能赚钱,因此,也没有想过用农业产业赚钱。我们认为,低估农业复杂性的主体说起来还“可爱”,还算是有情怀,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主体则低估了党和政府进行农业产业升级的决心和意志。

生产端做不好,或者说效果有限。第一,经营主体低估了农业的复杂性。尤其是一些跨界的工商业者,他们认为只要规模上去了,只要运用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的利润就应该是可观的。但实际上,农业是一个比工业还复杂的产业,因为农业生产需要与空气、阳光、土壤、水等自然物发生作用。即便是荷兰式的“植物工厂”,以色列的节水农业模式,也都要考虑空气、光(不是自然光但也要用 LED 照明)、土壤(营养液)、水等因素。植物工厂让很多因素能够得到控制,当然这能有效地减少对大自然的依赖,减少大自然带给农业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农业投资巨大,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正如养鸡场养出来的鸡一样,是“温室”产品。荷兰因为物候条件之原因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农业行业资本非常稀缺。由于与大自然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是一个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多的行业,很多自然灾害都容易对农业产生致命影响。

第二,经营主体高估了农业里的规模经济。他们认为只要规模上去了,农业就能赚钱,但事实上,农业规模经济效应值得仔细辨识。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可以统一购买技术、购买生产要素,统一出售,这样确能降低一些成本;但是与小农户的生产方式相比,也有成本提高的地方。比如,土地要素需要成本,每亩地的租赁价格一般都在 1 000 元左右,劳动力的成本也上升了,因为需要雇工。且不言劳动中的“出工不出力”,雇工本身就需要支付资金。这两项让农场的成本大大提高。如果没有小农户,成本提高可以体现

在农产品的价格中,但是由于处在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农产品的差异化价格难以得到市场认可。一二三产的融合确实也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但是这种附加值的数量能有多大,能否覆盖掉耕地和劳动力的成本也是很难说的。农业规模经济或许并不明显,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人地比例较大的国家来说。

第三,忽略了小农户的力量。在农业时代,中国无疑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的农业文明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让我们的文化绵延5000年而不绝,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度。创造农业文明的主体就是小农户,以至于我们的经济被称之为“小农经济”。这些小农户并非完全自给自足,实际上,他们与市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也并非唯农业是从,而是兼营手工业。^①通过家庭人员的内部分工,可以让这个组织的产值最大化,从而供养更多的人口。这一家庭生产模式也很有弹性,市场好的时候,他们通过更多地为市场生产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市场不好的时候,比如国家战乱、灾害频仍之际,他们则“独善其身”,用一种近乎封闭的方式完成家庭人口的赓续。他们是处在市场中的,土地、劳动要素也可以市场中交易。由于土地成本低,劳动可以“内卷化”,因此,他们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来生产农产品。这种模式让他们在与现代规模农业竞争中丝毫不落下风。事实上,在21世纪初农业资本主义扩张之际,小农的正面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与强调。《新小农阶级》的作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认为,小农农业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能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服务市场,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且能生产出有竞争性的农产品。^②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文献和经验,这些文献和经验正通过普通小农户的代际传递而不断延展。这些都是小农户的力量所在。

四、新的思路:从流通入手,以流通改造带动生产端的自动改变

中国的主要农产品都是小农户生产的事实,让我们从思考小农户的处境入手思考中国农业产业升级

的解决思路。

小农户努力生产普通农产品而不注重提高质量,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流通体系下,小农户没有动力生产优质农产品。我们访问过很多农户,听取他们的看法。其主要的障碍是生产了优质农产品没有人相信,也卖不上好的价格。总体核算下来,利润不增反而减少,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生产优质农产品了。尽管国家严加监管,但是能用化肥、农药或者其他有助于增产的东西还是尽量用。寿光蔬菜售卖全国,监管也很严格,但据当地的菜农们讲,不用化肥和农药,蔬菜的产量也上不来。而且,有些高毒性的农药也要用,因为不用不行,现在的虫子已经变得耐高毒了,农药打少了都不行,每次去一趟农资店买药,都需要至少200元。这不是小农户道德水平低下了,而是他们的理性和现实的困境使然。东北大田里的种植户,也知道土壤在板结,但是不用化肥农药也不行,因为不上化肥庄稼就不长,不打农药病虫害就会来啃食。更何况,如果只是一家不使用农药,别人都使用,那么这块地里的庄稼就没法要了,全是病虫害。

这种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消费者也知道。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很难认定蔬菜或者粮食是优质农产品时,其做法就是假定它们都不是,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售卖人的描述来确定质量。当然,价格是最为关键的,好东西很贵人们也不会买。一方面太贵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消费不起,另一方面可能面临上当受骗。因此,中国在农产品的供需上形成了一种“纳什困境”型的均衡,即生产者不生产优质产品,消费者只看价格是否便宜。

“纳什困境”型均衡的症结就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的环节太多,因为农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是经过中间商的。这样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并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也不了解生产者的生产过程。其二是生产者没有办法把农产品准时足量地运送到消费者手里,因为不掌握渠道,也没有这个能力。多年来形成的分工体系已经让他们安于一个小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只是生

^① 据历史学家许倬云研究,汉代的小农已经是兼业小农。从九月以后,田间的劳动告一段落后,农闲时光,人们会从事农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赚取现金的活动,比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甚至做一些运输和买卖。或近或远的交易网络,将零零散散的小农经济交织在一起。参见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78。

^②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35—180。

产,然后把农产品交易给市场上的“坐商”或者是流动的“行商”。价格完全是随行就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中间商具有价格谈判上的优势,于是,农产品的中间差价也被中间商获取了。这种差价有时候是巨大的,既侵蚀了生产者的利润,也降低了消费者剩余。比如,一斤黄瓜在产地出卖可能只有 0.8 元,但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时可能要花 4 元。农产品层层传递,价格也层层加码,利润也被层层剥夺。

这样的市场体系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自古以来,人们都离不开市场。生产者需要到附近的市场去出售自己的产品,不过如果远处的市场价格诱人,也专门有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假定交易成本低,假设每一个环节都有无数的竞争者,比如在流通环节,也不断有小贩子、大贩子加入进来,大家都是价格接受者,这样市场就会不断整合,信息会不断传递,价格也会趋于透明。但事实上中间商并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有可能是垄断的。即便不是垄断,他们与无数的小农户比起来也更加容易组织,从而获得超额收益。这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的“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

我们目前的粮食市场、畜禽市场、蔬果市场都是这样的体系。这种体系的特点简言之就是“流通支配生产”。在物质充裕的时代,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如果说在需求旺盛、生产不足的时代,生产者还有一定话语权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生产者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正所谓“渠道为王”。但是,如果中间商把农产品的大部分溢价都截获,且简单地以数量为量化标准的话,那么,作为生产者的小农户哪有动力生产优质农产品呢?而如果不能调动小农户的内在激励,农业产业的升级也只是痴人说梦。因此,我们主张从流通体系改造入手,来解决小农户的稳定获利问题。只要小农户能够在流通体系中掌握信息,就可以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自动升级生产模式。

五、改造方法:建构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

赋能是一个网红词汇,但实际上赋能的举措历

史上早已有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赋能的表现。国家通过这种制度变迁,让小农户身上的制度束缚消失不见,一方面获得了土地种植的自由决策权,另一方面也能获得收益权,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分配机制下,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比在生产队时多得多的劳动,结果就是农产品连续增产,让束缚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粮食问题一举得到解决,而且,不仅如此,农户还开启了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兼业传统,在已经足够照料好自己土地后,农户选择了创办村办、镇办企业,或者去这些企业里务工。乡镇企业的崛起让国家都没有想到,而它们的崛起则为国有企业改革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党中央为中国小农户赋能的结果。在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寿光模式也是一个值得一书的个案。很多人认为寿光模式就是农业产业化,实际上,这不是本质。寿光蔬菜能够发展,不是因为搞了产业才发展的,而是通过技术的引进以及政府的及时有效赋能才使得农业产业化的,也就是说产业化是结果,而不是发展的根本原因。寿光很早就具有蔬菜种植传统,这与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较好有关系。^①但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世纪 80—90 年代,遇到了蔬菜供大于求、价格随之降低之困局。后来,为了让蔬菜有更大的市场和快速的响应能力,寿光政府投资建设了蔬菜批发市场,并且发展了便捷的交通。这样蔬菜就可以走出山东与全国竞争。与此同时,三元朱村的王乐义带领大家搞冬暖大棚种植,改造生产端的供给。通过冬暖大棚种植,可以让山东常年生产蔬菜,而且产量非常高,能够错峰供给、反季供给。寿光建设大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方学不来,比如这里的冬天温度不是很低,土壤是黄土,而且土壤层很深。这些独特优势让寿光的冬暖式大棚采取深挖,冬天就不用加温,蔬菜平均生产成本较低,因此能够在流通中打败其他竞争者。这是那个时代寿光农业产业化能够得以发展的原因。寿光蔬菜的绝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小农户。寿光模式的核心逻辑就是政府赋能+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所赋的能是建立批发市场,改善交通条件,从而让山东蔬菜走出去。由于流通体系改善,广大小农户可以在种植中获利,

^① 山东实际上是黄河中的泥沙冲出来的,而黄河中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因此,山东的黄土层很厚,适宜耕种,也适宜建设冬暖大棚。

因此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蔬菜在寿光才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并且向“一村一品”分工格局演进。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赋能的重要意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今天的赋能内容与历史上的赋能内容不尽一致,因为条件改变了。以农业产业为例,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开足马力生产的问题,中国的很多农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了,人均产量也足以保障所有国民免受饥饿之苦。当下的问题是升级,是农产品质量提升且老百姓普遍都能消费得起的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赋能小农户让其单纯地增加产量,而是要赋能他们在保障产量的同时有意愿提高品质。

平台也是网红词汇,但平台的快速发展也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力量。学界已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平台经济。实业界更是把平台的概念落地生根,切实地打造出很多平台,比如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拼多多、美团、海尔等都是平台企业,美国的亚马逊、谷歌、脸书也都是这种类型的企业。^①在企业市值全球排名中,平台企业已然位于佼佼者之列。平台的出现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平台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不是现代的这种形式,比如古代的市场实际上就是各种货品的平台。某一个地方有集市,那么四面八方的卖者和买者就会向这个地方聚集,而且,这种聚集规模会越来越大,只要有足够大的规模,市场管理者就可以收取进场租金。市场无论中外自古都有,而且,也有长距离产品的大规模交易市场,比如12—13世纪法国的“香槟集市”。“香槟集市”是法国东北部至东南部多个城市举办的一系列集市的总称。来自英格兰、莱茵地区、佛兰德尔、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商人都汇聚于此,进行商品交易。这些集市共同促进了该地区的商业繁荣,也使得经济重心从南欧向西北欧转移。南欧多资金(美洲金银),而西北欧长于制造。资金不断地从南欧流向西北欧,西北欧利用这些资金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工业水平,另一方面也通过国际贸易引进了东方的技术。^②荷兰崛起、英国工业革命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工业革命是制造业不断升级的产物。“香槟集市”虽然地域广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起到了平台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平台从线下走到了线上。以前由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昂,需要市场来发现价格匹配供需,但现在由于信息成本极低,因此,市场规模就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生产者和需求者可以超越时空在网络上聚集。聚集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生产者都面临无数的需求者,每一个需求者也面临着无数的供给者。简言之,消费者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现所有的供给者,供给方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观察到所有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预期,网络平台的价值就凸显了。互联网平台一个最重要的效应就是双边网络效应,即一方的决策受到另一方数量的影响。以“滴滴打车”为例,如果司机预期到平台会有他的潜在乘客,那么,他就有动力加入到平台;如果乘客预期到平台上会有很多的司机为他服务,也许就有非常就近的司机,那么他也有意愿加入到平台中。因此,双边平台发展的核心在于平台网络效应的激发与扩展。对于农业平台来说,这种双边网络效应也会带来生产要素的集聚与产业升级。因此,我们提出,改造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方法是利用最新的理念建构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

很多人会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单独建立平台?目前平台公司很多,我们跟他们对接不就可以了,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改善。比如,阿里巴巴在农村建立很多淘宝村,主要职能就是借助于淘宝平台完成农村的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但事实上,他们在农产品上行上做得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农产品的物流体系相对复杂,没有冷库和冷链农产品上行就难以落地。目前,直播带货很火,包括很多名人和县市长都为自己家乡的农产品站台。对于滞销的农产品来说,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起到广告营销的作用,可以把消费者引流到乡村,有助于扶贫,但这种方式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由于平台采购员需要到农产品生产地把控质量,收集农产品,然后借助于物流为购买者供货,周期较长,很多消费者拿到农产品时已经变质。这一方面说明了平台线下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小农户参与平台的重要性。因为当下的平台公司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物流渠道,但主要的差价利润还

① 阿里研究院.平台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38—51.

② 萧国亮,隋福民.世界经济史[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7:35—68.

是被他们获取了。生产端除了卖掉滞销品之外并无额外利润,也不能自动触发小农户对于农业产业的升级。

国外的流通体系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日本,其可取之处是农协完成农产品的集中和流通,而农协是由农户组成的,他们不获取中间差价,只是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来匹配销售端。这样,就会让农业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利润大部分都回归到农户手中。再如,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荷兰农民合作社也是职能完备,涉及农村信用、购买、加工和市场。他们的合作社是非营利性组织,主要靠会员缴纳会费,小农户是他们的会员,会员通过代表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合作社的职能是为社员(会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其中包括采购生产资料、出售产品、加工和筹备资金等。我们的合作社由于起步晚,起步时的条件与荷兰、日本等国家不同,尽管在帮助农户上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条件下,也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和改造,即我们提出的综合赋能平台。

六、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的具体设计

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如果要做到真正的赋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小农户的参与,离不开公司的运营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由三方参与建设完成并实施运营,即国家、公司和农户。

国家为什么要参与?因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产业升级是涉及国本的百年大计,国家必须参与,而且要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①国家实际上对农业产业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每年的中央 1 号文件都在谈农业,多年来也投入了很大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资金来对相关行为和相关设施进行补贴,但实际效果与我们的期望相比还有差距。我们认为,国家可以改变投入方式,尤其是改变巨量补助某些生产经营主体或者现代产业发展园区的方式,将这笔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国家控股的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上。国家投入一定的资金后,就让这个平台的话语权实质上掌控在国家手里。当然,并不是全部所需资金都由国家出,还可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到这个平台

中来,国家资金有象征和引导作用。国家投入的资本也可以多渠道,比如乡村振兴基金、政策性资金、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资金等。社会资金可以包括银行资金和各大企业的资金以及个人基金。这些资金都可以流入到生产者手里,对其升级行为进行补贴,也可以贷款给小农户,以供应链金融的方式引导和促进小农户进行农业产业升级。通过这些方式,可以让支农资金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

公司参与有助于平台的健康发展。这一点类似历史上的官督商办,也有些类似于现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指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加入民间(非官方)资本,使得国企变成多方持股,但还是国家控股主导的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混合多方资本而混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国企在改革中能够增加竞争力和活力,为企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服从地方政府管理,保护农业生产端利益,具体落实平台的运营与管理。比如完成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对接,根据消费端的需求落实生产,完成农产品产销数据收集工作;完成农产品收集、运输、配送工作;监管农产品的产供销体系正常运转;导入高端要素进入到生产端,比如实施供应链金融、区块链金融,对小农户进行培训,引入外部技术资源,让技术落地到生产端,等等。

农户参与到平台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农户的身份把自己的诉求和价值主张通过合作社、农协和村集体上传,让平台的所有决策能和自己的利益捆绑,让平台能够为农户自身服务,而不是其他;另一种是以农产品的生产者的身份落实好生产。需要标准化生产时按照农协和合作社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需要生态农业时则能按照要求进行生态化农业的发展。小农户可以推举农户中的优秀人才担任合作社或者农协的带头人。很多人总是认为小农户就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能否进行标准化生产,主要是看标准化生产能否给其带来更多的利益。很多人认为标准化生产需要把土地集中到一个主体手里,必须让小农户出局或者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否则便不可能实现。事实上这并不绝对,虽然协调多人成本要高,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① 隋福民.完整认识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2):73—80.

且正如我们在前文中一再强调的,中国与欧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不同,我们在当下还找不到足够的非农就业空间,因此,小农户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存在。这种局面我们是不能改变的,只能适应。而且,小农户通过合作成为一个混然的主体也是可以实现。日本有合作社,法国有合作社,荷兰有合作社,而且这些合作社在组织农民进行统一化生产上都做得比较好。因此,小农户并不像很多人所想像的难以管理、难以组织,一盘散沙,一麻袋土豆,只要有利益导向,他们也能够生产出类似于大规模农场的标准化农产品。土地集中、农业产业工人不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前置条件。总而言之,平台是三方参与与管理的,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对于一个多方参与的组织来说,利益分配机制非常重要。我们主张让公司获得固定比例的服务收益,国家不获利。公司的利润随着平台覆盖面的扩大而扩大,随着在平台聚集的农户越来越多而获利。由于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前景可期,固定比例的收益也是很客观的。平台的主要获利者是处在生产端的小农户。

我们所主张的平台不仅仅是线上的,还包括线下的,是线上与线下互动前行的模式。线上主要完成信息沟通,高端要素的聚集、农业大数据的建设,供应链金融的实施等;线下主要完成农产品的物流、要素的物流、资金融通和落地,等等。之所以强调线下,是因为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工业品在一个封闭的厂房里通过流水线就可以生产出来,产品还耐储存。农产品需要与自然界发生互动,需要适合的土壤、气候、水资源条件才能生产出来,因此,有一定的地域性。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且不能随意调整。产出之后不易储存,粮食作物相对好一些,蔬菜、水果、肉蛋奶则需要较高的成本。农产品成熟时,不论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当时的价格,都必须卖掉。农产品不成熟时,无论价格多么高昂,自己也不能通过加班来生产出产品。另外,工业品种类繁多,很多也都不是必需品,农产品属于必需品,但种类少,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也相对简单,简言之就是“吃好吃好”。因此,农产品对于我们的流通体系再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已有的冷链系统和冷库容

量还不足以支撑农产品在全国和地区层面上的流动。作为一个综合赋能平台,不仅应具有线上信息对接的职能,也需要有线下的集采、分类、储存、甚至是再加工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在构建网络平台的同时,需要进行货场、冷库等农产品流通设施的建设。

我们所主张的平台是一个平台网络或者说平台生态的概念。最重要的节点是乡镇层面的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乡镇下面设有村级赋能站,上面有县级综合赋能平台和省级综合赋能平台以及国家农业综合赋能中心。乡镇作为运营主体,一方面接地气,可以有效组织当地农户,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规 模也足够大,足以支撑一个赋能平台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便于与上层沟通,汇集农业信息和相关需求给国家,便于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资金导入到基层产业发展上。乡镇平台可由国家、公司和乡镇三方投资,县级农业综合赋能平台可由公司、县和国家共同出资建设,主要职能是引资、引技术,对接一些高端资源,比如与国外有关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国家级平台,国家出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化管理。

七、平台的作用及演化场景

第一,平台是流通体系中的节点。小农户和国家通过在平台中的主导作用,掌控这一新的流通体系,进而完成对传统的市场流通体系的逐渐替代。由于信息和农产品都是通过这一新体系完成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对接,传统市场中的中间商差价被重新定义。这一差价不再是资本的暴利,而是组织物流等相关对接服务的成本加成,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利润留给小农户,消费者的消费价格也相对低。^①于是,他们也可以消费到质量较好的农产品。由于农户升级农产品可以获得稳定持续的利润,因此,他们也有动力在农协或者合作社的组织下进行高标准的生产。一旦他们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高品质农产品销售渠道,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高品质农产品供应能力。这样就会让农业产业升级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① 这里低的概念不是价格低于普通农产品,而是相对于目前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来说是低的。目前的优质农产品也存在,比如高科技农业园区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价格高昂,普通消费者基本消费不起。

第二,促进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职能转变。国家定位自己应该是一个赋能的角色。赋能的主角是小农户。我们一定要相信小农户的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曾经由于很多年轻的农人进城务工,国家开始担心农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方法是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激励措施是鼓励农地流动,对规模经济进行补贴,在政策上支持鼓励家庭农场,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在农业实践中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管 理技术。但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难以推广开来,原因是中国农业领域的资本稀缺,生产出来的优质农产品只能覆盖部分高端客户,因为价格很高。这样的农产品具有市场天花板。尽管国家也有一些政策,但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没有资本的小农户没有办法进行产业升级。在 21 世纪初期,随着中国农产品的供过于求,有一些农户准备利用自有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但由于国家的补贴政策,让他们的升级难以成功。因为他们的资金是有成本的,而获得国家补贴的那些“掠食者”的资金成本很低,竞争是在不公平的条件下完成的。小农户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升级的想法,按照传统方法持续地投入劳动,因为劳动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他们可以以“内卷化”的方式完成农业生产过程,从而追求更高的产量。国家补贴的家庭农场在实践中运行得并不好,成了离不开娘的孩子。一旦没有补贴,便迅速地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很多对农业不了解的工商业主,都在农业上折戟沉沙。这些家庭农场,尤其是大型的家庭农场,并没有成为普通小农户的效仿对象。一则他们没资本,二则这些农场也不能获得利润。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为广大的小农户,尤其是主粮作物、蔬菜。小农户没有产业升级的能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国家在生产端改造的措施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成功。因此,需要转变思维,我们的方案可以促进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实现国家真正的治理现代化。

第三,便于国家掌控农业大数据。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对于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农业大数据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也是极为重要的。这种重要资源需要由国家掌控。

我们对流通体系再造对于中国农业产业升级进行了想象。相对于丰富的实践和中国地区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言,我们所提出的方案还是简单的。在实践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核心思路,即让小农户和国家共同掌控新流通体系,以流通体系的再造带动产业自动升级,中国的农业产业一定会在中华大地上掀起新的篇章,中国的农业格局以及农产品质量都会有一个根本的提升。

小 结

建立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的好处是通过对流通体系的改造可进一步激发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这种积极性可以有助于完成农业的产业升级。农业产业升级之后的好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可以消费优质农产品,自然环境因此也会得以改善。这样,才是真正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国家需要转变思路,从替代农户的思维转移到为他们赋能的思维,让小农户自发地动起来,正如曾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让中国农业发生巨变。由于国情和历史不同,中国没必要也不可能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尤其是欧美式的道路。中国具有独特的时空条件,比如,我们的数字经济如火如荼,我们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我们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品制造能力,我们已经拥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供应体系,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农业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和切入点,我们通过平台网络的建设一定能重构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生态,从而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小康路上我们与农民的“手拉手”。

(责任编辑:李贝贝)